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者文选

何其芳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何其芳 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何其芳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ISBN 7 - 5004 - 3779 - X

I . 何… II . 中… III . ①何其芳—文集②文学理论—文集 IV . I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7405 号

责任编辑 周兴泉

责任校对 石春梅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1201 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5 插 页 2

字 数 322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3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

1999年11月14日

编者的话

何其芳同志是五四以来的著名诗人、散文家和理论家。作为诗人和散文家，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知名。他开始从事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工作是在 40 年代，是在他到了延安以后。他开始做古代文学史研究，则是在 1953 年主持文学研究所工作以后。他曾在《〈论红楼梦〉序》中说过：“1942 年延安整风运动以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放弃了我所比较熟悉的创作，开始从事文学批评。后来深感没有研究过我国的和世界的文学史，仅仅根据一些已成的文艺理论和当前的文学现状写批评文章，很难写得深入，很难对于理论有所丰富和发展。我又还感到我国文学史上的许多杰出的作品还不曾得到足够的估价，科学的说明；如果在这方面能研究出一些结果来，对于创作，对于文学爱好者，以至对于提高民族自信心，都会大有益处。”就在这篇序文中，他还说：“1953 年 2 月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我打算研究中国文学史。当时正准备纪念屈原，我就从研究他开始，写出了我的第一篇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论文。”

但事实上在 1951 年撰写的《关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一文中，他就已对新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

任务作了正确的阐述。他说过这样的话：五四时期，中国曾经有过一次对文学遗产和文化遗产重新估价的运动。因为这个运动的锋芒主要是针对着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它的成就也主要表现在对于旧文学旧文化的彻底破坏方面。在这以后，思想贫乏的资产阶级学者不可能对我国许多重要的文学遗产和文化遗产的思想内容及其特点作出科学的估价。这样的任务，左翼的文化工作者也还没有来得及去完成。因此，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全国胜利以后的今天，必然要产生再一次的对文学遗产和文化遗产重新估价的运动，这就是认真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估价。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的编选原则，本书主要收录了作者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撰写的学术论文，本应以《屈原和他的作品》为起始，但考虑到何其芳同志的具体情况，我们选录了他在 40 年代写的《谈民间文学》和在 50 年代初写的《关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并以《谈民间文学》为这个选集的第一篇文章。

何其芳同志的论文内容涉及面较广，有不少重要论文的篇幅都很长。根据这套丛书的统一要求，我们只选录了 15 篇学术论文，它们不可能涵盖作者的全部学术成就，但大致可以反映出他的一些最重要的学术观点和重要的理论建树。如《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南》是他研究和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论文中论述问题比较集中的一篇，也是他撰写的同一命题论文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章。《论阿 Q》和《论〈红楼梦〉》是表达他的关于文学人物典型论的最早两篇论文。《关于现代格律诗》则是集中体现他的建立现代格律诗主张的学理文章。至于那篇由毛泽东主席作过修改的《〈不怕鬼的故事〉序》，更是发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文章。

我们在选录过程中总有捉襟见肘之感，也有挂一漏万之忧。

有一些未能录入的论文其实也是各有代表性的，还有一些反倾向的论争文字也自有时代特点，而且其中往往提出了十分重要的见解，如 1955 年发表的《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一文中说：“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才有可能逐渐解决我国文学史上的许多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我们的文学史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那样众多，以至我们粗粗一望，就像展开在我们的面前的许多地方都还是未曾开垦的土地。这需要长期的辛勤的工作。但这个工作做好了，却又可以反过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中国文学史上是有一些问题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过去所不曾处理过的，深入地加以研究和解决，就必然不只是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正确，而且能够以一些具体的内容来丰富它。比如，在欧洲的文学史上，封建社会的文学是不很出色的，而中国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却都产生在封建社会，这就是一个显著的差异。”像这样的在古代文学史研究上的战略观点，就它提出的时间来考察，具有一种十分重要的创意，因而也就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由于字数的限制，我们几乎舍弃了他的大量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文字，好在《何其芳文集》和《何其芳全集》都已出版，读者自可参看。

这个选集由我和周永琴同志负责选编，选目是由我酌定的，所选论文的收集、校订以及《作者主要著作书目》和《作者年表》的撰写工作，都由周永琴同志承担完成。这个选集所收的论文都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何其芳文集》，我们作了必要的校订，其中有的论文涉及当时的政治事件和对人物的评价，时代痕迹明显，与今天的看法已有不同。为保持论文的历史原貌，我们未做改动，读者当能理解。一并说明如上。

邓绍基

2003 年 7 月 20 日

目 录

编者的话	(1)
谈民间文学	(1)
关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	(4)
屈原和他的作品	(15)
关于现代格律诗	(39)
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	(57)
论阿 Q	(82)
论《红楼梦》	(96)
《琵琶记》的评价问题	(204)
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229)
正确对待遗产，创造新时代的文学	(263)
托尔斯泰的作品仍然活着	(285)
《不怕鬼的故事》序	(307)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南	(317)
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	(358)
曹雪芹的贡献	(390)

作者主要著作书目.....	(418)
作者年表.....	(420)

谈民间文学

高尔基对民间的文学的估价，我觉得是最恰当不过了。我曾经花了一些时间去研究民歌，所看的各省歌谣在两千首以上，而结果却是我对一位朋友叹息道：我的研究只是证明了高尔基的意见的正确，并不能超过他。

高尔基说：“如果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创作那就不可能知道劳动人民底真正历史。”的的确确，我们今天似乎还没有一部讲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思想的历史。比如一提到旧礼教，我们总以为它像天罗地网一样，最严密地统治着封建社会的各个阶层的。读了许多民歌，我才知道其实不然。在一个地区的一千首以上的民歌中，我只找到了两三首是完全宣传封建道德的。而明白地从各种问题上反对封建秩序的却很多。江西南部有这样一首客家民歌：

米筛筛米朵朵滴，
讲到老妹東（这样）贞节；
牌匾三串四百钱，
买到基（它）来做席歇（睡）。

你看，在农民眼中，代表封建道德之一的贞节牌匾算得什么呢！福建长汀还有这样一首民歌：

壁头打钉挂橡鞋，
有情哥哩只望来，
总要两人私情好，
唤我丈夫让开来！

这又是何等大胆泼辣的农民妇女的口气！

不仅在婚姻问题上农民是这样尖锐地蔑视着旧礼教。对于封建社会的根本结构，地主剥削农民的“合法”事实，民歌中也有着清醒的反映与抗议。也是江西南部的客家民歌就有这样一首：

该家东家做唔（不）惯，
茶又莫吃饭又宴。
涯（我）要想基（他）几个钱，
基就要涯一条命。

南昌还有一首《长工歌》，诉说当长工的十二个月的辛苦。其中说，长工磨麦但只有麦皮吃，长工打鱼却只能吃到半边鱼头，长工窖酒却全给东家享受，而且一年忙到头，工钱又被扣光了，只有“光身回家去过年”。

就仅这点例子，不也就说明了封建社会的统治并不稳固，而又还可从它们窥见农民的力量和智慧吗？

所以，高尔基又说：“民谣是与悲观主义绝缘的。”鲁迅先生也认为民间文学“刚健清新”，为士大夫文学所不及。这并不是神秘的不可解释的现象。这是因为农民是经常在进行着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缘故。

高尔基要求苏联的作家们充分注意民间文学，并把旧俄的一般作家未曾吸收利用口头传说作为一个很大的弱点。这就更把民间文学和专家的创作问题联系起来了。在这一点上，也许我们倒可以对于高尔基的意见有些增加。高尔基似乎着重民间传说可以作为专家创作的素材。而在中国今天的新文学，则为了解决大众

化问题，民族形式问题，更非研究并吸取民间文学形式的长处不可。已经快三十年了，在新文学领域内最早出现的新诗却似乎到现在还最成问题。一般的意见是既不好读，又不好记。这个弱点刚好是民歌的优点。也许有人说，民歌多七言四句，像旧诗，用口语来写恐怕很多束缚吧。其实北方的民歌就不是死板板的七言，而只是音节大致差不多。比如陕北的“信天游”，就两句一首，表现生活与情感很自由：

白格生生脸脸太阳晒，
巧格溜溜手手拔苦菜。

马里头挑马一般高，
人里头挑人數你好。

鸡蛋壳壳点灯半哟半炕明，
烧酒盅盅掏米也不嫌你穷。

并且我们也不一定要死套民歌体，我们还可加以改变与提高的。因为我只是民歌看得多点，我以它为例来说明我们的创作应该吸收民间文学形式的长处。其他如民间故事，民间戏剧，以及其他民间文学形式，我想，也同样有许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这也并不是我的创见。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了：“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

当然，这是就民间形式的发展前途而言，并非可以一蹴而至。就是一时或者许多都还不能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吧，那又有什么关系！真能使文艺与人民结合，尤其是与农民结合，中国的新文艺就是空前的迈进。而这个巨大的迈进，却非经过似乎细小的搜集、研究与学习民间文学不可。

1946年10月23日

关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

梁山伯祝英台故事是流行得最广泛的中国民间传说之一^①。它这样流行并不是偶然的。它十分强烈地歌颂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纯洁的爱情，无论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无论死亡，都不能把他们分开。梁山伯虽然饮恨而死，祝英台却并没有被马家抬去，而是在她的祝告之后，梁山伯的坟墓忽然在大雷雨中裂开，她跳了进去。有些地区的传说还有一个尾声，那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后来变成了一双蓝色的蝴蝶，或者变成了天上的彩虹^②。这样的结局自然都是浪漫主义的。然而这正是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它使得这个爱情的悲剧不但符合古代的现实，而且又带着坚强的希望，乐观的精神。其实整个梁山伯祝英台故事都有一种传奇的

^① 不但流行于中国南北各省，并曾传到国外。《民俗》周刊第93、94、95期合刊上钱南扬的《祝英台故事叙论》说，有人曾在朝鲜得到过朝鲜文的梁山伯祝英台印本。

^② 我见到的多数民间故事和唱本是说祝英台走进梁山伯的坟墓中去的时候，被人扯下的裙子或衣衫变成一双蝴蝶。但也有说蝴蝶就是他们两人的化身的。化作天上的彩虹，见广东黄诏年编的《蛇郎》。我的家乡四川的传说又说他们变成了一对鸟。并且真有一种身如鸽子大、羽作深蓝色、雌雄总在一起、其中有一个拖着尺来长的红色尾巴的鸟被人们叫为梁山伯、祝英台。

色彩。梁山伯的性格是那样朴质、单纯，和祝英台同窗三年却并不知道她是女扮男装，而一旦发现了她的真正性别但又断绝了结合的希望以后，他就以死殉情。祝英台的性格是那样机智、大胆，她既善于在平时掩盖她的改装，又敢于在和梁山伯分别的时候表达她的爱情。在梁山伯死后，虽然她的父亲极力阻止，她却不顾习俗地去吊孝，并且完全违背了她父亲提出的不穿孝、不大哭、速去速来这样三个条件。所有这些虚构和夸张不但是文学艺术所允许有的，而且也是这个故事能够广泛流传的原因。

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的要求，并且预言了这种要求最后一定会得到胜利。因为它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那些无名的民间创作家一方面固然要在某些点上使梁山伯祝英台的性格适应两人的社会身份，故事的结局适应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自然会按照劳动人民自己的面貌和愿望来创造这一对他们所喜爱的人物及其结局。

由于抱着这样的看法，我读到北京《新民报》副刊上的一篇有关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文章^①，就不能不感到很大的惊异了。这篇文章本来是评论东山越艺社演出的《梁祝哀史》的，然而它却首先否定了许多唱本和地方戏：

我从别的一些地方戏里以及一些小调唱本里，看到过或听到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那里，梁山伯是一个十足的傻蛋，不特毫不理解人生里面的爱情，甚至连生活里的小节都一无所知。而祝英台在此时候，也就变成了淫贱的婢女似

^① 这篇文章题目为《论〈梁祝哀史〉的主题》，作者龚纯，发表在1950年9月18日和25日的北京《新民报》副刊《新戏剧》上。

的，毫无羞涩，风情毕露，下流而恶劣。我看的时候，就感到我们的民间艺人未免糟蹋这两位屈死的情侣。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作者或演出者对于这个事情的思想内涵不理解或不能理解，而多半是从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来处理它。他们所坚持的还不就是男性永远统治，女人总是贱妾，稍微超出钦定的道德规范，他们就会以正义的面貌出现，大加非议，高唱世风之不古。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是这个规范之积极的破坏者，将女人搜罗在他的周围，听其纵欲。竖立贞节牌坊，以实行对于女人的性欲宣泄。将女人推入沉渊似的，疯狂的夸饰着坏女人的范例，怂恿着文学艺术来表现它，以达到道德的惩戒作用。同时，又矛盾的支持与培养着娼妓制度。这是不公平的。可是，乡野的农民却是从这种思想影响下扮演着祝英台，这是在地主资产阶级的教养里造成的结局。

“乡野的农民”和许多表现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唱本、地方戏，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被戴上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或者他们的“思想影响”的帽子。接着这篇文章就批评东山越艺社演出的《梁祝哀史》并没有对原来的传说“给予一定的批判”，并没有“将前人给予梁祝的思想面貌加以清刷”。为了“美化祝英台与梁山伯”，这位批评者说，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应当写成这样：

祝英台应该是热烈、勇敢、坚定、聪明、多情、美丽的女性，其矛盾的一面可能有超世的思想，表现为放逸不羁。同时，她过着贵族生活，使她的封建观念被给予培养，而在情绪上总是较为苦恼矛盾的人。

梁山伯的性格是善良、诚恳、勤苦、有些拘谨，然而热烈真挚，固然不是利禄熏心，而是被迫的走着士大夫求功名

的老路。晋家天下是四方有难的，现实给他刺激，可能使他同时保有傲物厌世思想，因而也有着一股“清气”，不是“俗子”，所以方获得祝英台的好感。封建束缚增厚了书生风味，因而也就在日常生活上不大精明，有他的纯厚可爱之处。

这位批评者又认为《梁祝哀史》里缺乏“斗争”，“只看到祝英台背信弃义，不敢有积极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祝英台成为柔弱无刚令人讨厌的俗物”，没有能够“使多少年月里被一些艺人歪曲了的祝英台获得解放”，“树立一个不屈的自由的女性塑像”。最后，他说“《梁祝哀史》在尾声里添了一个充满迷信的收场”，并且“由此想到，吊孝里面的梁山伯死后不闭眼睛的问题，也觉得还是旧的荒唐观念的因袭”。

我没有看过东山越艺社的《梁祝哀史》的演出。这个剧的全部脚本我也还没有找到，只读了他们印的《剧词选刊》。但这篇批评所接触到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脚本的好坏，而是对于民间原来流传的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看法。它所指责的东山越艺社的脚本的缺点，主要就是对于原来的传说“批判”不够，改动不多。就我所看到的《剧词选刊》说来，的确那是保存了许多民间传说原有的情节和色彩的。然而我的意见却和北京《新民报》副刊上的那位作者刚刚相反，我认为这正是一个优点。因此，我觉得那篇批评代表了目前已经存在的一种不好倾向，这种倾向就是简单地鲁莽地对待过去的文学遗产，并企图以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想法来破坏那些文学作品原有的优美地方。

我这并不是说过去那些表现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唱本和地方戏就没有缺点。已经印成书的唱本常常是经过了城市里的某一类作者的加工，比起劳动人民原来的朴素而又美丽的口头传说，难